

日本 FTA 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路径

赵金龙 顾玉龙

摘要：本文依托 1997 年日本数据，运用二元响应模型分析了日本 FTA 战略的决定因素及其发展路径，同时对日本未来的 FTA 路线图进行预测。研究表明：日本 FTA 战略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重点，长期影响其选择 FTA 伙伴的主要是日本与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远近”、“要素禀赋差异”、“贸易互补性”和“贸易结合度”等因素。理论模型准确预测了日本 54 个 FTA 中的 51 个，准确率为 94%；另外，预测到了日本 94 个非 FTA 伙伴中的 85 个，准确率为 90%。

关键词：日本；FTA 战略；影响因素；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 (2018) 04-0036-11

2002 年，日本政府正式出台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将“东亚各国确定为日本 FTA 战略的重点，率先与东盟各国建立 FTA”。2004 年，日本调整 FTA 战略，明确了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 FTA 战略目标。2010 年，日本将 FTA 谈判重点转为“大型经济圈”，FTA 战略开始全面深入实施。

一、文献综述

关于日本 FTA 战略的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虽然已经不少，但多数文献依赖定性和比较分析，重点分析日本 FTA 战略形成的原因、特征和挑战等因素，该领域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关于单个 FTA 研究，研究内容包括 FTA 实施的背景、可行性、挑战、潜在经济效应和应对策略等方面，相关研究文献如 Kawasaki（2003）、David 和 Patrick（2008）、Hidetaka 和 Patrick（2010）等。此类研究多对日本 FTA 战略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二是研究日本 FTA 战略的产业效应或者政策性评估，包括日本 FTA 政策转变及成因、进程和特点、冲击和挑战等方面，相关文献如 Hidetaka（2005，2006）、Shujiro（2014）等。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日本 FTA 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其重振国内经济、加速融入东亚经济圈。FTA 战略的动机则主要包含：（1）对外被迫应对全球 FTA 的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赵金龙，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顾玉龙，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我国 FTA 战略对外贸与经济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CJY002）。

消除面临的歧视性关税,对外拓展日本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例如 Shujiro(2014)等;
(2)激活日本的经济结构性改革,重振日本经济;(3)增强日本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发言权。另外,部分学者探讨了日本 FTA 战略形成的政治原因以及国内利益集团对 FTA 路径的影响,如 Hidetaka(2005,2006)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重点研究了日本 FTA 战略实施的背景和原因、现状和态势、目标和特点、标准和伙伴以及中国因素等内容。赵洪(2004)、朴英爱和金香兰(2014)都研究了日本 FTA 的背景和原因,认为日本 FTA 战略起因于外部 FTA 的迅猛发展和内部经济与政治双重压力;贺平(2014)分析了日本 FTA 的现状和态势,此类文献基本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 FTA 战略的现实发展与变化;张祖国(2004)、赵放(2010)和李明权(2015)等研究了日本 FTA 的目标和特点,认为日本 FTA 战略将亚洲作为重点,同时认为日本 FTA 战略具有“规避农产品竞争、旨在保护本国企业国际市场和竞争”的特点;倪月菊(2013)等研究了日本 FTA 战略的中国因素,认为日本需要加强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此外,刘晨阳(2012)和倪月菊(2013)等探讨了日本 FTA 战略与 TPP 之间的关系。

日本 FTA 战略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是下文研究的重点。赵晋平(2003)、Hidetaka(2006)及 Shujiro(2014)等国内外相关文献多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对此进行了定性分析。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现存文献多将日本 FTA 战略的影响因素分析归纳为拓展海外市场、促进国内改革及争夺东亚经济主导权等几个方面;发展路径分析大多直接引述或者间接解读日本政府公布的 FTA 官方文件。现存文献对于日本 FTA 战略背后反映的复杂经济、政治和地缘等因素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实证诠释。为了克服当前相关研究文献之不足,作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日本 FTA 战略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

二、日本的 FTA 战略

截至 2015 年底,日本已签署了 16 个 FTA,还与几十个国家正在进行谈判。

(一)日本 FTA 战略的提出

2002 年 10 月,日本外务省公布《日本 FTA 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日本选择其 FTA 伙伴国重点考虑五大标准:经济标准、地缘标准、政治与外交标准、可行性标准和时间标准。据此日本 FTA 战略“以亚洲地区为重点,谈判伙伴的优先顺序为:韩国、东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智利、南部共同市场、俄罗斯和印度。在将来,日本需要与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建立 FTA。”^①日本 FTA 战略特别注重如下 3 方面的问题:优先与东亚国家构建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の FTA 战略.<http://www.mofa.go.jp>.

FTA; 追求东亚地区经济主导权; 积极与墨西哥构建 FTA, 消除关税歧视和贸易转移。

(二) 日本 FTA 战略的调整

2004 年 12 月 21 日, 日本对 FTA 战略进行调整, 明确了实施 FTA 战略的目的: 促进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和确保本国的经济利益; 形成对日本经济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 推进日本的产业结构改革。同时, 日本重新制定了选择 FTA 谈判对象的 12 条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 3 个方面的内容: 能否确保日本的经济利益; 能否形成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环境; 谈判对象国的地域状况是否具有实现 FTA 的可能性。2004 年日本 FTA 战略调整了谈判的优先顺序, 明确了“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三) 日本新 FTA 战略

2010 年 11 月, 日本政府通过《全面经济伙伴基本政策》, 重新阐述了日本新的 FTA 战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3 点: 依托国内改革提高开放度、推进更高水平的经济伙伴关系; 以更广泛的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实施 FTA 战略的重心; 谈判对象国由经济小国变为巨大经济圈。

总之, 日本的 FTA 战略, 虽经数次调整, 不同时期重点存在差异, 但大致遵循初期、中期和长期 3 个阶段的布局。从日本多年来推行 FTA 战略的实践来看, 大体按照循序渐进、逐步扩张的模式不断演进。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以 Baier 和 Bergstrand (2004) 的理论模型为基础, 假设如下: 国际贸易发生在两个垄断竞争部门之间; 消费者因产品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偏好; 生产具有固定成本且存在规模经济; 生产要素只有资本与劳动两种, 其在部门间能够自由流动, 但不能在国家间流动。我们以这些假设为基础, 依托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贸易关系等 3 要素构建模型, 运用二元响应模型分析日本 FTA 战略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路径。

(一) 贸易关系因素

1. 在距离等因素不变条件下, 两国的关税越高, 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大。高关税抬高了日本产品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 使得日本产品的比较优势降低, 阻碍了出口。因此, 日本倾向于选择对本国产品征收较高关税的国家签订 FTA。本文将 1997 年各国从日本进口产品的 MFN 加权平均关税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

2. 两国贸易相互依存度越高, 贸易关系越紧密, 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大。本文贸易结合度指数 (TI) 是日本对贸易伙伴国 i 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 i 进口总额占世界 w 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数值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联系越紧密。

$$LTI_{ij} = \ln[(\frac{X_{ij}}{X_j})/(\frac{M_i}{M_w})]$$

3. 与伙伴国的贸易量越大, 则伙伴国的贸易重要性越大, 与之签订 FTA 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本文采用日本与伙伴国的贸易额占日本总贸易额的比重来衡量日本伙伴国对日本外贸的重要性 ($TSHARE_{ij}$)。

4. 两国进出口产品的互补性越强, 则两国贸易能够更加充分利用其产品优势, 签订 FTA 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本文参考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自由贸易协定影响评估方法》中贸易互补性 (C) 的计算方法:

$$TC_{ij} = 1 - \left\{ \frac{\sum_{\theta} \text{abs} \left[\left(\frac{M_{ig}}{M_i} \right) - \left(\frac{X_{jg}}{X_j} \right) \right]}{2} \right\}$$

M_{ig} 为伙伴国 g 产品的总进口额, M_i 为伙伴国的总进口额, X_{jg} 为出口国 g 产品的总出口额, X_j 为国家 j 的出口总额, θ 为产品种类。本文先基于 SITC 一位码分类计算国家 j 出口与伙伴国 i 进口的贸易互补性 TC_{ji} , 再求出伙伴国 i 出口与国家 j 进口的贸易互补性 TC_{ij} , 最后求出进口与出口互补性的均值并取对数:

$$LATC_{ij} = \text{Ln}[(TC_{ij} + TC_{ji})/2]$$

5. 日本工业自由化水平很高, 但政府对农产品保护严重, 在多边贸易谈判中, 农产品一直是日本关注的焦点。因此, 农产品竞争力的大小对日本 FTA 伙伴国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伙伴国的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ARCA$) 纳入模型中。

(二) 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追求也是促成 FTA 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 FTA 战略虽然着重于经济合作, 但同时考虑政治和安全因素”(Shujiro, 2014)。“在地缘政治研究中, 地理因素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FTA 的建立有助于缓解和消除区域内国家的争端和纠纷, 增加互信”(倪月菊, 2013)。我们假定:

(1) 两国签订 FTA 所获得的净福利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向关系, 两国距离越近, 则从 FTA 中所获得的福利越多, 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大。天然自贸区比非天然自贸区获得的福利更多 (Krugman, 1991; FSW, 1998)。因此, 两国距离越近, 签订 FTA 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本文定义 $nature$ 为距离变量, 用两国距离的倒数取对数后得到 $Nature_{ij} = \text{Ln}(Dist_{ij}^{-1})$ 。

(2) 给定两国的距离, 日本与贸易国距世界上其他国家越远, 则两国从 FTA 中所获得的福利越多, 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大。根据 Vinner (1950) 的理论, 贸易量越小, 关税的扭曲作用越小, 而贸易量越大, 关税的扭曲作用越明显。距离较近的国家, 贸易量较大, 消除关税壁垒后, 产生的贸易转移更少, 两国增加的净福利将会更多。 $REMOTR_{ij}$ 表示日本 j 和 i 国距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距离。

$$REMOTE_{ij} = \frac{\text{Ln}(\sum_{k=1, k \neq j}^N Dist_{ik}/N - 1) + \text{Ln}(\sum_{k=1, k \neq i}^N Dist_{jk}/N - 1)}{2}$$

(3) 由于日本积极追寻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 FTA 战略的发展重心集中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希望通过中日韩 FTA、东盟 10+6 和 TPP 等多方协议来制约各方对

手,以确立其自身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具有很强的区域政治性。因此,本文也将对象国是否位处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二元变量纳入模型中(*AsiaPa*)。

(三) 经济规模与要素禀赋

1. 两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则签订 FTA 获得的净福利越多,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大。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其产品的种类越丰富,能够用于出口的产品量也越多。由于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本文侧重考察伙伴国经济规模,以实际 GDP 表示一国经济规模($PRGDP_i$)。

2. 两国的经济规模越相似,则签订 FTA 获得的净福利越多,签订 FTA 的可能性也就越大。Baier 与 Bergstrand(2004)通过 CGE 模型发现,两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越相似,从 FTA 中获得的福利也就越大,并通过大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该假设的准确性。市场规模可以用一国的实际 GDP 来表示,先将两国的实际 GDP 做差后取绝对值,然后取对数来表示两国的市场规模差异($DRGDP_{ij}$)。

$$DRGDP_{ij} = \ln(|RGDP_i - RGDP_j|)。$$

3. 两国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大,则两国从 FTA 中获得的净福利也就越多,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大。通过签订 FTA 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两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扩大贸易量,增加福利。两国要素禀赋差异(DKL_{ij})的计算方法如下,首先用日本和伙伴国 i 的资本劳动比做差后取绝对值,然后再取对数: $DKL_{ij} = \ln(|KL_i - KL_j|)$ 。

4. 两国的资源禀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大,则从 FTA 中获得的净福利越小,签订 FTA 的可能性越小。两国的资源禀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大,说明两国拥有的资源有限,而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较为丰富,若两国签订 FTA,则两国贸易违背 H-O 理论,易发生贸易转移,从而对该国福利造成损害。日本和伙伴国 i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我们用 $DROWKL_{ij}$ 表示(K 为一国的资本总量, L 为一国的劳动人口总量),计算方法如下:

$$DROWKL_{ij} = \frac{\{[\ln[(\sum_{k=1, k \neq j}^N K_k)/(\sum_{k=1, k \neq i}^N L_k)] - \ln[K_i/L_i]] + [\ln[(\sum_{k=1, k \neq j}^N K_k)/(\sum_{k=1, k \neq i}^N L_k)] - \ln[K_j/L_j]]\}}{2}$$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 模型介绍

本文运用概率单位模型对 FTA 的内生性进行检验,该模型源于一个满足经典线性模型假定的潜变量模型: $y^* = \beta_0 + X\beta + e, y = 1[y^* > 0]$ 。其中: y^* 为无法观测变量或潜变量; β_0 为截距项; X 为一个包含多个解释变量的行向量; β 为一个包含多个系数的列向量; e 为随机误差项,其独立于 X ,并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我们用记号 $1[*]$ 来定义一个二值结果,称其为指标函数,若 $y^* > 0$,则 y 为 1;若 $y^* \leq 0$,则 y 为 0。 y 的响应概率可表示如下:

$$P(y=1|X) = P(y^* > 0|X) = P(e > -(\beta_0 + X\beta)|X) \\ = 1 - G[-(\beta_0 + X\beta)] = G(\beta_0 + X\beta)$$

则 probit 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P(y=1|X) = G(\beta_0 + \beta_1 x_1 + \cdots + \beta_k x_k) = G(\beta_0 + X\beta)$ 。

其中, G 是标准正态的累计分布函数(cdf), 对所有实数 Z , 都有 $0 < G(Z) < 1$, 这就使得估计出来的响应概率严格地介于 0 和 1 之间, 其公式可表示如下:

$$G(z) = \Phi(z) \equiv \int_{-\infty}^z (2\pi)^{-1/2} \exp(-z^2/2) dz$$

对潜变量 y^* 进行定义, i 国建立 FTA 前后的效用分别为 U_i^0 和 U_i^1 , j 国建立 FTA 前后的效用分别为 U_j^0 和 U_j^1 , 则 $\Delta U_i = U_i^1 - U_i^0$, $\Delta U_j = U_j^1 - U_j^0$ 。

惟有当建立 FTA 后两国的效用水平都有所提高, 两国才可能达成 FTA。令 $y^* = \min(\Delta U_i, \Delta U_j)$, 则当 $y^* > 0$ 时, y 为 1, 两国才会达成 FTA; 当 $y^* < 0$ 时, y 不为 1, 两国不会达成 FTA, 则建立 FTA 的概率可用下式表示: $P(\text{FTA} = 1) = P(y^* > 0) = G(\beta_0 + X\beta)$ 。

(二) 数据来源

日本已经签署和正在谈判的 FTA 都被视为有效研究样本(FTA 伙伴), 样本数据中包括了日本 54 个 FTA 伙伴与 94 个非 FTA 伙伴, 总共包括日本 148 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解释变量相关数据分别选自 WITS、CIA、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 其中各国资本量数据难以获取, 因此使用各国的人均实际 GDP 来代替人均资本量(K/L), 数据选择基期均为 1997 年。

表 1 模型控制变量及其预期作用

变量	含义	符号	数据来源
<i>NATURE</i>	两国临近程度	正	The GeoDist (两国间的距离)
<i>REMOTE</i>	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平均距离	正	
<i>AsiaPa</i>	是否位处亚太地区	正	The GeoDist
<i>PRGDP</i>	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	正	World Bank(1997 年实际 GDP)
<i>DRGDP</i>	两国经济规模差异	负	
<i>DKL</i>	两国要素禀赋差异	正	World Bank (1997 年人均实际 GDP, 以人均 GDP 代替人均资本量 K/L)
<i>DROWKL</i>	两国与其他国要素禀赋差异	负	
<i>WTARIFF</i>	MFN 加权平均进口关税	正	WITS (各国对日本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
<i>TI</i>	贸易结合度	正	World Bank (1997 年实际贸易量)
<i>TSHARE</i>	贸易份额	正	
<i>ATC</i>	平均贸易互补性	正	UN Comtrade (1997 年两国各类产品的进出口额, 参照 SITC 分类标准)
<i>ARCA</i>	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	负	

(三) 实证分析

日本的 FTA 伙伴不仅包括单个国家, 而且包括欧盟(EU)和海合会(GCC)等一体化联盟。在运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 我们分列两种情况进行对比研究: 第一, 将 EU 和 GCC 分别作为单一经济体(方法一); 第二, 将 EU 和 GCC 各自的内部成

员国单独进行分析（方法二）。此外，对日本的其他伙伴国如东盟等从内部各成员国视角进行研究。

1. Baier 模型

首先运用 Baier（2004）模型对日本 FTA 战略进行分类分析，模型实证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EU 和 GCC 成员国作为整体的回归结果（方法一）

变量	(1)	(2)	(3)	(4)	(5)	(6)
<i>Constant</i>	-11.028*** (-5.64)	4.347 (0.26)	-66.441*** (-3.00)	-55.693** (-2.30)	-56.214** (-2.19)	-62.706 (-0.33)
<i>Prgdp</i>	0.427*** (5.31)	0.521*** (4.75)	0.711*** (4.23)	0.667*** (3.61)	0.671*** (3.48)	0.675*** (2.98)
<i>Natural</i>		1.953*** (4.41)	2.475*** (4.08)	2.538*** (3.74)	2.514*** (3.24)	2.519*** (3.19)
<i>Remote</i>			7.760*** (3.24)	8.434*** (2.90)	8.469*** (2.86)	8.478*** (2.84)
<i>DKL</i>				-1.491 (-1.58)	-1.506 (-1.55)	-1.506 (-1.54)
<i>Drowkl</i>					0.046 (0.06)	0.042 (0.06)
<i>Drgdp</i>						0.219 (0.03)
<i>Obs</i>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注：括号内为 *Z* 值，***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表 3 EU 和 GCC 成员国作为单个国家的回归结果（方法二）

变量	(7)	(8)	(9)	(10)	(11)	(12)
<i>Constant</i>	203.459*** (3.53)	162.451*** (2.94)	156.012*** (2.90)	244.203** (2.43)	245.643** (2.43)	-60.952 (-0.58)
<i>Drgdp</i>	-7.012*** (-3.54)	-5.550*** (-2.92)	-4.512** (-2.44)	-6.951** (-2.06)	-7.130** (-2.08)	2.564 (0.73)
<i>Drowkl</i>		-1.016*** (-4.18)	-1.913*** (-4.75)	-1.524*** (-3.39)	-1.548*** (-3.37)	-1.712*** (-3.15)
<i>Natural</i>			2.465*** (5.23)	2.507*** (4.82)	2.531*** (4.79)	3.022*** (4.52)
<i>DKL</i>				-1.727*** (-3.65)	-1.762*** (-3.62)	-1.396** (-2.37)
<i>Remote</i>					0.479 (0.37)	2.175 (1.33)
<i>Drgdp</i>						0.430*** (3.25)
<i>Obs</i>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注：括号内为 *Z* 值，***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由于 Baier 核心模型（模型 6）中的 *DKL*、*Drowkl* 和 *Drgdp* 等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选择模型（3）作为基准模型进行预测分析，该模型预测到了日本 26 个 FTA 中的 18 个，准确率仅为 69.2%。

Baier 模型（模型 12）中的 *Drgdp* 与 *Remote* 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DKL* 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符号与理论基础相违背，所以 Baier 模型仍然不能有效解释日本 FTA 的影响因素。然后，依托所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模型（9）进行预测分析，可以预测到日

本 54 个 FTA 中的 41 个，准确率为 75.9%，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日本 FTA 伙伴国的影响因素，模型的解释能力优于前者。由于方法一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联盟内部单个国家的独立特性，而且在计算方法上也容易因选择标准的差异而引起算法上的混乱。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除了预测结果存在差异以外，两类方法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解释变量也存在差异。因此，为了与 Baier（2004）模型保持经济学逻辑上的一致，

在本研究中,重点通过方法二(从单个独立国家视角)进行实证分析。

2. 三要素理论模型

根据日本 FTA 的发展实践和前文假设,可以认为“贸易关系”、“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特征”3 类因素是决定日本 FTA 战略的主要因素,3 类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决定了日本 FTA 战略的发展方向。为此,在 Baier (2004)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变量调整和修正,引入 3 类因素的解释因子,对日本 FTA 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进行实证阐述。

表 4 模拟结果显示:*Drgdp* 与 *Lwtariff*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Ltshare* 与 *LTI* 无法同时在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13) 中,*Drowkl*、*Natural*、*LATC* 和 *Ltshare* 等 4 个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14) 中,*Drowkl*、*Natural*、*LATC* 和 *LTI* 等 4 个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13) 对 FTA 的预测准确率为 90.74%,而模型 (14) 的预测准确率为 94.44%,具有更好的解释力。与 Baier 标准模型相比,三要素理论模型对日本 FTA 战略的预测准确率更高。因此,选择三要素理论模型 (14) 作为本研究的基准模型(见表 4)。

表 4 三要素理论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3)	(14)	(15)	(16)	(17)	(18)	(19)
<i>Constant</i>	35.074*** (5.37)	33.081*** (5.61)	34.683*** (5.33)	34.063*** (5.11)	69.450 (1.03)	83.144 (1.16)	79.037 (1.10)
<i>Drowkl</i>	-1.888*** (-3.55)	-1.948*** (-3.95)	-1.791*** (-3.22)	-1.757*** (-3.13)	-1.761*** (-3.16)	-1.329** (-2.39)	-1.310** (-2.36)
<i>Natural</i>	3.008*** (4.82)	2.923*** (5.12)	2.979*** (4.79)	2.912*** (4.53)	2.893*** (4.55)	2.725*** (3.98)	2.885*** (3.82)
<i>LATC</i>	3.486*** (3.63)	4.462*** (4.84)	3.347*** (3.40)	3.322*** (3.38)	3.301*** (3.36)	2.818*** (2.85)	2.729*** (2.73)
<i>Ltshare</i>	0.335*** (3.76)		0.368*** (3.38)	0.361*** (3.28)	0.321*** (2.54)	0.344*** (2.61)	0.367*** (2.65)
<i>LTI</i>		0.310** (1.99)	-0.113 (-0.55)	-0.094 (-0.45)	-0.058 (-0.27)	0.025 (0.11)	0.031 (0.13)
<i>Lwtariff</i>				-0.045 (-0.38)	-0.049 (-0.41)	0.031 (0.19)	0.063 (0.36)
<i>Drgdp</i>					-1.233 (-0.53)	-1.789 (-0.72)	-1.594 (-0.64)
<i>ARCA</i>						0.052 (0.63)	0.059 (0.70)
<i>AsiaPa</i>							-0.242 (-0.53)
<i>Obs</i>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注:括号内为 Z 值,***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 。

3. 分阶段回归分析

日本 FTA 战略先后经历了 2004 年和 2010 年两次重大调整,因此我们将 FTA 伙伴国按开始谈判时间分为 2002~2004 年、2005~2010 年和 2011 年之后 3 部分,并以 3 个时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仅列出显著的变量)。

由表 5 可知, 2004 年是日本 FTA 战略发展方向变更的转折点。2004 年之前, 地缘政治因素的两个变量 (*Natural* 和 *Remote*) 均显著, 而 2004 年之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变弱, 传统贸易关系 (*LATC* 和 *LTI*) 的影响增强, 并且新增了要素禀赋因素 (*Drowkl*)。由此可以看出, 2004 年之前, 日本选择 FTA 伙伴国着重考量了地缘政治因素, 而 2004 年之后, 贸易关系和经济利益则主要决定了日本 FTA 战略的发展方向, 这正体现了“确保日本经济利益”和“将广泛的亚太地区作为日本新时期 FTA 战略发展的重点”等内容。

表 5 分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2002~2004 年	2005~2010 年	2011~2016 年
<i>Constant</i>	-55.21 (-1.32)	20.39*** (3.26)	33.081*** (5.61)
<i>Drowkl</i>		-0.90* (-1.75)	-1.948*** (-3.95)
<i>Natural</i>	6.34** (2.31)	1.87*** (3.00)	2.923*** (5.12)
<i>LATC</i>	3.64* (1.65)	2.82*** (2.60)	4.462*** (4.84)
<i>LTI</i>		0.80** (2.30)	0.310** (1.99)
<i>Remote</i>	10.13* (1.84)		
<i>Prgdp</i>	0.83* (1.87)		
<i>Obs</i>	108	117	148

注: 括号内为 *Z* 值,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4. 模型检验

(1) 拟合优度检验

三要素理论模型 (14) 中的 4 个解释变量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变量符号正确, 并且系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采用观察正确预测百分比的方式来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将 0.5 的概率作为分界点, 并将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该模型对 FTA 和不存在 FTA 的预测准确率分别为 94.44% 和 90.43%, 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有效解释了日本 FTA 战略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路径。

(2) 聚类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 通常假定样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即日本各个 FTA 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现实中可能并非如此, 当样本间存在关联性时, 模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就会受到影响。因此, 本文在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聚类分析。我们将欧盟、海合会和东盟成员国视为 3 类不同的国家组, 组内部成员间不是严格相互独立的, 但国家组之间相互独立。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各变量系数保持不变, 模型整体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3) 异方差检验

由于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或模型忽略了一些因素 (政治因素等) 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造成异方差。对非线性 Probit 模型的检验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分布设定检验 LR 统计量 (最大似然比), 另一个是 Silva (2001) 提出的非嵌套分布设定偏误检验的 LM 统计量。LR 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似然比检验的 *P* 值为 0.27, 可以接受同方差

的原假设; LM 检验结果与 LR 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接受原模型同方差假设。

(4) 样本偏差问题

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 日本将欧盟作为单一经济体进行谈判。本模型将欧盟成员国作为单个国家进行考量,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定性, 剔除模型中的欧盟数据, 然后对模型结果和稳定性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各变量系数符号保持不变, 系数大小变化并不明显, 且均在 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5. 实证结果分析

三要素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 模型准确预测到了日本 54 个 FTA 中的 51 个, 准确率为 94.4%; 同时预测到了日本 94 个非 FTA 伙伴中的 85 个, 准确率为 90.4%。结果整体表明该模型对日本 FTA 战略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路径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日本与贸易伙伴的距离 (*Natural*)、要素禀赋差异 (*Drowkl*)、贸易互补性 (*TC*) 和贸易结合度 (*TI*) 等因素是影响日本选择 FTA 伙伴的主要因素。首先, 日本与较近距离国家签订 FTA 的可能性较大, 这正好体现了日本以东亚为中心、谋求“东亚经济圈”主导地位的 FTA 地缘政治战略。其次, 日本 FTA 战略注重经济利益和贸易关系, 将贸易结构、贸易比重和外贸紧密程度等经济因素作为选择其 FTA 伙伴的重要标志。然后, 日本 FTA 战略同时考虑到 FTA 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与伙伴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经济因素。最后, 作为资源稀缺型国家, 日本对 FTA 伙伴国的选择反映了其长期坚持的资源整合战略, 在日本的 FTA 伙伴国中, 超过半数以上是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

五、结论

本文在 Baier 和 Bergstrand(2004) 模型的基础上, 依托日本 FTA 战略的实践, 构建新的三要素理论模型, 并运用该模型对日本 FTA 战略的原因和实施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发现: 日本与贸易伙伴的距离、要素禀赋差异、贸易互补性和贸易结合度等因素是影响日本选择 FTA 伙伴的主要因素, 且预测结果令人满意。

根据研究发现对日本未来的 FTA 伙伴国进行了分析与评估, 本文认为以色列、乌克兰、俄罗斯等国适宜作为日本未来 FTA 战略实施的最优目标国。

参考文献:

- [1] 贺平. 新型跨区域主义的重要一环: 日本—欧盟 EPA/FTA 初探 [J]. 日本学刊, 2014,(2).
- [2] 李明权. 日本 FTA 进程落后于韩国的原因探析——基于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J]. 日本学刊, 2015,(4).
- [3] 刘晨阳. 日本参与 TPP 的政治经济分析 [J]. 亚太经济, 2012,(4).
- [4] 倪月菊. 日本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中日韩 ETA 还是 TPP? [J]. 当代亚太, 2013,(1).
- [5] 朴英爱, 金香兰. 日本 FTA 政策变化及评价 [J]. 现代日本经济, 2014, 33(5).
- [6] 孙世春. 日本的 FTA 战略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J]. 日本研究, 2007,(4).
- [7] 赵放. 日本 FTA 战略的困惑 [J]. 当代亚太, 2010,(1).
- [8] 赵洪. 日本的 FTA 战略与东亚经济合作 [J]. 东南学术, 2004,(S1).

- [9] 赵晋平. 迈向制度性经济合作——日本 FTA 战略若干评价及多方案比较选择 [J]. 国际贸易, 2003,(8).
- [10] 朱颖. 日本实施 FTA 战略的进展和挑战 [J]. 东南亚研究, 2006,(3).
- [11]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64(1).
- [12] Chiavacci, D., Ziltener, P.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FTA/EPA) with Switzerland[J]. Asiatische Studien, 2008, 62(1).
- [13] Corning, G. P. Japan's Bilateral FTAs: No Obstacle to Progress in the Doha Round[J]. East Asia, 2007, 24(1).
- [14] Frankel, J. A., et al. Continental Trading Blocs: Are They Natural or Supernatural?[M]//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15] Jacob, V. The Customs Union Issue[J]. New York, Carnegie, 1950.
- [16] Kawasaki, Kenichi.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Asia[R].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3,03-E-018. <http://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dp/03e018.pdf> 農林水産政策研究所 レビュー.
- [17] Krugman, P. The Move Towards Free Trade Zones. in Policy Implication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C].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RB of KansasCity. 1991.
- [18] Mulgan, A. G., Where Tradition Meets Change: Japan's Agricultural Politics in Transition[J].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005, 31(2).
- [19] Plummer, M. G., et al. Methodology for Impact Assessmen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M].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 [20] Santos, Silva J. M. C. A Score Test for Non-nested Hypotheses with Applications to Discrete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1, 16(5).
- [21] Urata, S. Japan's Trade Policy with Asia[J]. Public Policy Review, 2014, 10(1).
- [22] Yoshimatsu, H., Ziltener, P. Japan's FTA Strategy toward Highly Developed Countries: Comparing Australia's and Switzerland's Experiences, 2000 - 2009[J]. Asian Survey, 2010, 50(6).
- [23] Yoshimatsu, H. Japan's Keidanren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Societal Interests and Trade Policy[J]. Asian Survey, 2005, 45(2).
- [24] Yoshimatsu, H. The Politics of Japan's Free Trade Agreement[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06,36(4).

The Impact Factors of Japan's FTA Strategy and Its Development Path

ZHAO Jin-long GU Yu-lo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and the path of Japan's FTA strategy by a qualitative choice model depending on the data in 1997.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Japan's FTA strategy and models' results, the roadmap of Japan's FTA strategy in the future has been empirically predicted. Our conclusion reveals that although Japan's FTA Strategy shows different features and focuses in different periods,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distance, the difference of factor endowment, trade complementarity and trade integration degree between Japan and its partners have always worked as the essential causes which affect Japan's option for its FTA partners in the long term. The empirical model correctly predicts 94% of the 51 Japan's FTAs in 54 existing in 2014 and 90% of the remaining 85 no FTA pairs in 94.

Key words: Japan; FTA strategy; impact factors; development path

(责任编辑: 张建华)